



民国文学史论 第二辑

李 怡 张中良 主编

# 文史对话 与大文学史观

李 怡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民国文学史论 第二辑

李 怡 张中良 主编

# 文史对话 与大文学史观

李 怡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 / 李怡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6

(民国文学史论 / 李怡, 张中良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5360-8834-4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1175号

出版人：肖廷兵  
专业审读：罗执廷  
特邀编辑：张灵舒  
策划编辑：张 璞  
责任编辑：张 璞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杨亚丽 贡日亮

---

书 名	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 WENSHI DUIHUA YU DAWENXUE SHIG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2 1插页
字 数	410,000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6.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总序一：文学研究与历史意识

李怡

在相对平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近几年出现的“民国文学”研究的设想似乎是值得注意的动向，面对这样一种动向，有人认为是打破某种学术停滞的契机，但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无论如何，有关民国的话题已经成为我们无法绕开的存在，即使质疑，也有必要理解它生成的理由。

在我看来，借助“民国社会历史”这一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提出了“民国”这一概念，更大的价值是它提示我们，文学的研究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之中。既然中国史已经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又有什么必要独立出一个“民国史”呢？这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关注和描述民国特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情态。一般说来，古代、近现代，这都是世界通行的普泛性概念，这些概念的意义在于昭示了一种共同的人类历史进程，其意义自不待言。但是普泛性的概括并不能代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遭遇和问题，共同的历史进程之中，依然掺杂千差万别的“民族史”“区域史”，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独特的东方“现代”国家，许多历史的细节都不是西方话语体系的“近现代”所能够涵盖的，中国的“现代”就集中发展于“民国”，所以研讨“民国”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国的“现代”历史是什么。近些年来，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界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领域，可以说，在尊重、回到历史的取向上，历史学家已经走在了学术的前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重视“民

国”历史种种，从根本上讲就是得益于历史学界的启示。

因为这样的启示，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才开始摆脱了“理论的焦虑”，在新的领域找到了自我充实的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理论的焦虑症。先是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继而又用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来框架我们的现象，到头来发现它们都难以准确描述现象的丰富和复杂，这才出现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回到历史现场”、体察具体历史情境之类的倡议。

当然，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也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它关乎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牵涉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应当成为“非理论”“去理论”的简单借口，在更深的地方，“理论”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将可能恰到好处地推进我们的认知。“回到现场”不是绝圣弃智，不是排斥理论思维能力，而是让我们的理性的能力更妥当地敞开事实呈现的广阔空间，或者说理性思辨的节奏和方向与丰富的历史事实两厢贴合。自然，这样的历史考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至少不是我们表述学术态度时那么容易。文学研究最终依靠的不是一种“表态”而是更为深邃的能够破解精神秘密的“意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在尊重历史现象中产生的，但又不是对历史现象的乱七八糟的堆砌，其中深含着自身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成熟，所以，“回到历史现场”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只有哪一家的“现场”，它同样值得讨论、辨别、清理和驳诘。

这样，我们的“民国文学史论”就有了第二辑，也许还会有第三辑。连续性的发展表达的是不同认知的结果，重要的在于，随着我们对“民国”特定历史的逐步“返回”，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了，观点也日益丰富了。

感谢那些多年来一直关心我们研究的同行、朋友和广大的读者，我们都在不断充实着自己，在越来越深入的历史考察中解读现代的

中国，在越来越广阔的视野中丰富我们的思想意识。当然，也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这些有理想有坚守的优秀编辑，没有你们的策划、督促和鞭策，也绝不会有这连续数年的学术工程。

2018年8月于成都江安花园

## 总序二：还原民国文学史

张中良

不止一次听到质疑：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早已获得公认，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提出民国文学史？

尽管存在着质疑，而且对民国文学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这个概念总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扩大了探讨的空间。

民国文学史的概念，1994年见之于一套“中国全史”时，只是参照历代文学史的分法，标志着一个时段，并没有涉及多少民国赋予文学的意义。现在，仍有学者持同样的理解。2006年，秦弓提出“从民国史视角看现代文学”，意在把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史的历史语境中去重新审视。2009年，李怡阐述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几年来，民国文学乃至民国文学史的概念逐渐凸显出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等举办的学术会议都曾就民国文学问题展开过讨论，《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文艺争鸣》《广东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金陵科技学院学报》《兰州学刊》《当代文坛》《江汉学术》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从讨论来看，民国文学史确有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所不能表征的独特而丰富的意涵，既然如此，“民国文学史”的梳理、叙述与阐释又有何不可？

在相当长的时期，民国是一个禁忌。人们每每把民国简化为一个败亡的政府，如果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表述的话，通常是“解放前”“旧社会”。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政府如果不腐败，怎么会被推翻？旧社会如果不黑暗，怎么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探讨民国问题呢？

然而，问题在于：民国在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建成，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非历史的耻辱；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曾经寄托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而国家从来就不等同于政府，民国有多种势力对峙、冲突、交错、并存的政治，有虽然地区之间并不平衡，但毕竟曾经几度繁荣的经济，有由弱到强的外交，有终于赶走侵略者的抗日战争胜利，有大踏步发展的新式教育，有束缚与自由交织的新闻出版，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等等，怎么能够因为民国政府的最后败亡而抹杀民国的一切？民国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诞生到成长再到衰败，怎么可以由其结局否定此前的所有历史？

即使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能无视民国的存在。中国向来有后世修史的传统，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研究被列入其中，然而，1957年的“反右”使规划搁浅，在接下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政治形势下，民国史研究没有人敢于问津。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口述史等资料经过整理面世一批，但没有一种以“民国”冠名。1971年9月13日三叉戟折戟温都尔汗之后，“文革”狂潮呈现衰势。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号召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启动研究与编写工作。但在“文革”后期，学术研究步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民国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sup>①</sup> 史料的发展

---

<sup>①</sup> 参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导论”，第2—5页。

掘、整理与出版，敏感问题的探索，均有可喜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4卷本）、李新担任总编的《中华民国史》（12卷本）<sup>①</sup>等代表性成果先后问世，引领读者走近民国史的真实。

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文学的历史还原方面要落伍很远。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思考问题，怯于拓展新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还有人担心研究民国文学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历史已经走到21世纪，多少惨痛的教训才换来了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可能固然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良知、人民的觉醒，如果有谁再敢倒行逆施，很难得逞。民国文学史研究的指归，小则是要呈现真实的民国文学史风貌，丰富人们的历史认知，大则是要普及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保障社会稳步前进。

以新民主主义观点、现代性或20世纪眼光来梳理与阐释文学史，自然各有所长，但是民国文学在民国的背景下诞生、成长，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表现了独特的民国风貌，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来看，从迄今出版的近600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来看，回避民国文学概念，便无法揭示文学的民国基因，因而，很难准确地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全图，无法解释文学发展的复杂动因，也无法理解民国文学的多元内涵与艺术个性。

民国政治自始至终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对峙自不必说，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客观上给新文学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发展空间。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期间不仅存在着尖锐的国共冲突，而且两党之外还有活跃的自由主义阵营、根基深广的民主主

<sup>①</sup>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义力量，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派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但又各自保留着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有陕甘宁边区、新辟的敌后根据地与广义的国统区之别，而且在国统区内部，也有桂、粤、滇、晋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是民国文学形成多样形态的重要原因。民国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陷，也存在着法律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巨大反差，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还是有一定的法律保障。若不然，鲁迅怎么能够在对教育总长的诉讼中胜诉、恢复了被免去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在他成为左翼作家之后，怎么能够躲得了牢狱之灾，继续他的著译事业？在“白色恐怖”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于是，才会有色彩斑斓的民国文学。民国时期，尽管确有政治压迫与文化管制，但民国文学却能在错杂的空间中得以发展，不仅内蕴丰盈复杂，而且审美风格也是千姿百态。

民国文学应是民国时期文学的总称，就文体而言，不仅有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也有传统形式的旧体诗词、戏曲、文言小说、文言散文，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改良体；就政治倾向而言，不仅有官方属意甚深而命途蹇涩的三民主义文学，官方倡导且得到广泛呼应的民族主义文学，也有左翼倡导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还有“五四”以来脉息不绝的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就创作方法而言，不仅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方法的杂糅重构；就审美格调而言，有《凤凰涅槃》式的豪迈弘放，也有《义勇军进行曲》式的慷慨悲壮，还有《再别康桥》式的缠绵悱恻；从喜剧风格来看，有鲁迅浙东式的冷隽幽默，也有李劫人式的麻辣川味，有老舍杂糅着京味儿与英国风的月色幽默，还有张天翼式的湖南辛辣讽刺；就城乡文明倾向来看，有新感觉派式的斑驳陆离的都市色彩，也有沈从文式粗犷与清新交织的湘西风光，还有赵树理最为典型、叙事偏于传统的乡土

通俗，等等。气象万千的文学风景，无论是其内蕴，还是其形式，都在民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都与民国的机制息息相关，因而民国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外部研究，而且含有审美机理的内部研究。

民国文学史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我与李怡教授曾经交流过，我们都认为，一部成熟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有扎实的研究作基础，与其现在匆匆忙忙地“凑”一部民国文学史，毋宁脚踏实地地考察民国文学与民国政治、经济、法律、战争、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自然环境及灾变诸多方面的关联，考察文学所表现的民国风貌，考察民国文化生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或曰民国文学审美建构不同于前后时代的特色），然后再进行民国文学史的整合性的叙述与分析。我们不去奢望将来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叙述仅由民国文学史来承担，那样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大一统式的构想本来就是与学术自由相背离的。但我们相信，民国文学史的叙述必定会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我们的构想与努力有幸得到花城出版社乃至上级管理部门的认同与支持，“民国文学史论”第一辑六卷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于2014年出版，并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5年绩效考评中获得“优秀项目”。丛书问世以来，有学者在海内外发表评论，予以积极的肯定。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民国文学话题也遇到一些质疑，但探索并未中止，视野与深度反而不断拓展，曾经一度持有尖锐意见的学者也加入了推进民国文学研究的队伍，这正是我们所希冀的良性学术生态。花城出版社张瑛副编审在成功策划了“民国文学史论”丛书第一辑之后，又积极策划第二辑、第三辑。如果说第一辑主要是在观念与宏观方面打下基础的话，那么，第二辑则较多在语言、审美品格、文学教育、经典作家、形象和刊物等典型个案等方面做

出新的拓展，第二辑的问世将会进一步丰富读者对民国文学的认识。第二辑 11 卷同样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感激自在不言之中！这无疑也增强了我们将民国文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信心。

2018 年 8 月 19 日修订于上海

# | 目 录 |

引论 “方法”为什么重要 / 001

## 第一编 文史对话与大文学观

第一章 文史对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 007

一、从“文学审美”到“文史对话” / 007

二、两种不同的文史对话 / 013

三、文史对话的中国道路与问题意识 / 017

第二章 “文学本身”、民国文学机制与大文学观 / 024

一、“回到文学本身” / 024

二、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 / 028

三、大文学史观 / 033

第三章 文史对话中的“文学”

——以《狂人日记》为例 / 039

一、作为社会历史文献与作为文学文字 / 040

二、在“知识考古”之外的文学写作 / 047

三、幽暗人性的探秘与现代主义的形式 / 051

## 第二编 文学与国家、革命

### 第一章 大文学视野与现代“革命文学”研究 / 057

- 一、“革命世纪”的文学主题 / 057
- 二、多重“革命文化”的存在 / 060
- 三、“大文学”与新方法 / 065
- 四、问题与对策 / 068

### 第二章 重申五四文学运动的“革命”话语 / 071

- 一、被质疑的“革命” / 071
- 二、“革命”与“复兴” / 077
- 三、“革命”的多重声音 / 081

### 第三章 被忽略了的现代问题

——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冲突融合 / 087

- 一、分裂的国家与民族意识 / 087
- 二、构建国家：民族意识研究的新图景 / 088
- 三、历史事实与历史态度 / 090

### 第四章 国家与革命

——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 / 092

- 一、“政治经济学”的认同与歧路 / 093
- 二、“国家主义”的殊途与同归 / 097
- 三、从旧制度的批判到新国家的皈依 / 101

## 第五章 难以回避的尴尬：国家主义时代的民族情怀

——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历史命运 / 104

一、“自由主义”的民族情怀? / 104

二、民族关怀和国家理想的缠绕与龃龉 / 109

三、国家主义：陷阱般的存在 / 115

## 第三编 文学的多重文化资源

### 第一章 中国新诗：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冲突

——再审中国新诗的诞生 / 121

一、晚清“新诗”诞生的多重背景 / 122

二、“新派诗”与“五四”的尝试 / 125

三、问题的堆叠与追求的反复 / 128

### 第二章 大众传媒与新诗的生成 / 136

一、现代传媒与诗歌的载体及功能 / 136

二、报章杂志对新诗形态的塑造 / 138

### 第三章 鲁迅的新语文：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拿来” / 144

一、当代语文之争中的鲁迅 / 144

二、鲁迅的语文意识 / 145

三、鲁迅丰富的语文实践 / 147

### 第四章 复兴什么，为什么复兴？

——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一瞥 / 150

一、郭沫若的“复兴”思想 / 150

二、“三代以前”与郭沫若的终极追溯 / 153

三、文化复兴与历史批判 / 157

第五章 “农村人进城”与《骆驼祥子》的当代意义 / 161

一、版本问题：老舍在哪里更自由地敞开了自己？ / 161

二、祥子：农村人进城的故事 / 162

三、祥子与“革命” / 163

## 第四编 文学的体式

第一章 开拓近现代私人日记研究的新领域 / 169

一、中国私人日记的关注史 / 169

二、亟待开辟的学术领域 / 172

三、私人日记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可能 / 176

第二章 《从军日记》与民国“大文学”写作 / 179

一、“不成文学”的《从军日记》 / 179

二、《从军日记》中人生关切 / 181

三、何谓“日记” / 184

第三章 旧体诗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 / 188

一、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 / 188

二、诗歌史是什么史？ / 190

三、精神史意义上的旧体诗词创作 / 191

## 第五编 巴金三题

### 第一章 巴金，反什么“封建”与如何“反封建”

——重述《家》到《寒夜》的精神脉络 / 197

一、巴金“反封建”的特殊意蕴 / 198

二、从《家》到《寒夜》：伦理探索的深化 / 202

三、走向成熟的“反封建” / 205

### 第二章 大文学视野下的巴金 / 208

一、“真”与“无技巧”的争论 / 208

二、真：历史与文学的目标 / 209

三、“无技巧”的人生意味 / 213

四、“大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 216

### 第三章 《随想录》的“重复”与“唠叨” / 220

一、“重复”与“唠叨” / 221

二、沉迷性述说与焦虑的纾解 / 226

三、有意识建构的文学 / 229

## 第六编 在“民国”发现文学史料

### 第一章 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史料的意義与限度 / 237

一、“史料”与“思想意识” / 237

二、“学术规范”与史料的边界 / 239

三、文献史料的“限度”问题 / 243